

百姓记事

黔中旧事

乡村的良心 ■马卫

小时候，父亲常说，娃儿呵，人活着一定要讲良心。

啥叫良心呢？父亲从来没有具体说过，也许文盲的他说不清楚。可是，他和乡亲们做的点点滴滴，我多年后才悟出，那就是良心，乡村的良心。

有一年，天大旱。我们三队，还有四队、五队、六队，全靠黑水沟的水来灌溉稻田。我们三队地理位置优越，在沟的源头，按理可以扎断水沟，将水全部纳入堰，保障灌田。当时，作为生产队的水田巡管员，父亲没有这样做，而是和其它三个队的水田巡管员协商，每个队按时间，每天轮流灌六个钟头。

个别社员有意见，说我父亲“莽”，就是傻、憨、呆的意思，父亲嘿嘿一笑，不理他们，我行我素。

父亲在家里说，我们要吃饭，人家四五六队的人就不吃饭？这水是天生的，不是我们队花钱买的。

我读小学时，大队来了六七位知青，住在五队。他们无聊时，喜欢偷狗摸鸡，

钓鱼捉黄鳝。这个大家容忍了，直到有一次，这些知青带了鱼腾精，从黑水沟的源头倒下去，沿途的鱼虾蟹全被毒死了。

这下，社员们不干了，把在河沟里钓鱼的知青围了起来。

那时，公社设有知青办。

那时，围攻知青是大事。

可是，围攻的，不是一个两个，一二十，而是好几百人呢。

社员说，钓鱼、捉鱼都可以，惟有不能毒鱼，因为把鱼的子子孙孙都灭绝了，而且水也有毒了。

最后，知青们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因为错实在他们。从此，乡亲们背后都叫他们昧良心的人。

土地下户后，杨伯承包了集体的一片杜仲林。

按说，为了利益，他可以施化肥催长，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杜仲价格一度暴涨。可是他却不用化肥，全部用农家肥，特别是绿肥。人们问他为啥？他说，杜仲是药呵，催长的药性不好。

尽管这样他家的收入要少些、晚些，但得到了众人心里的暗暗夸赞。

这便是乡村的良心。看得见，摸得着。

当然，乡村也有失去良心的，口头上叫味良的，或没良心的。比如，现在的一些蔬菜种植户们，就用了大量的化肥农药催长素。他们自己吃的菜，完全不用化肥农药。

比如，养鱼的人，把塘里的鱼在河沟里放几天，冒充河鱼，卖大价钱。

这样的事太多太多，数不胜数。

乡村在渐渐淡化良心，因为金钱的诱惑，因为市场经济下的趋利心态。但是，乡村坚守良心的还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些耄耋老人。难怪“耄耋”的含义是“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我走在家乡土地上，感受到温暖。

是因为乡村还有良心，还有那些让人感觉到有爱、有情、有关怀的点点滴滴，细枝末节。就像山溪，仍然纯洁，就像野草，永远青纯，就像蓝天，不含杂质，笼罩大地。

珍藏那本购粮证

■何迪喜

在我家里，至今保存着一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购粮证。前不久，整理衣柜时偶然发现躺在柜中的它，睹物思情，勾起我对它的记忆……

七八十年代，国家还不富裕，粮食政策还没放开，城镇居民吃粮问题全靠国家粮食部门供应。那时，购粮证只有城镇户籍居民才有，每月凭证按人口、定量到就近粮管所（站）购买。由于持购粮证购粮有大米供应（当然还伴有杂粮），那时，居民（现在城镇户籍）成了许多农村人追求的梦想。记忆中，在我的家乡，谁家女儿要是嫁上一个当居民的丈夫或谁家儿子娶上一个当居民的媳妇，意味着可以吃上“国家饭”了，是一件很风光的事，令周围人羡慕不已。居民户口自然成了那年代的“香馍馍”。很多农村父母为了使子女“跳农门”，经常对孩子说谁家的孩子有出息了，现在吃上大米饭了，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当上居民有好日子过。

家里珍藏的购粮证，至今仍保留着红色塑料外壳封面，虽然年代久远，但封面上“购粮证”三个大字仍十分醒目。该证有手掌般大小，呈长方形，里面首页有公安、粮食部门签章、发证机关和日期，有户主及家庭成员姓名，并注明成人、儿童（或少年）每月粮食供应的定量。每月购粮时只需带上购粮证和粮票到粮管所（或粮站）登记后即可。记忆中，成人每月粮食定量是24市斤（其中包括面条、面粉、包谷等杂粮），儿童、少年大米是12市斤，大米每斤价格只是一角三分八厘。我家距粮站不远，四百米左右路程。每月到月底时，我总喜欢陪母亲到粮站购粮。母亲用购粮证登记好并交完钱、粮票后，我便拿起提粮单随粮管员到粮仓提粮，称完数后我总捡些小包的扛上肩膀（一般是杂粮），与母亲高高兴兴的回家。那时，由于年少缘故，感觉自己很威风。一路上，虽然很累，但想到回家有大米饭吃，那种劳累顿时烟消云散了。

那时，我家有五口人，每月供应的粮食吃不完，总要剩下一二十斤，剩余的粮食，母亲都要送给附近那些生活很困难的村民。当然，村民是讲情义的，为了感谢母亲，受助村民会时常拿些自种瓜果蔬菜回馈母亲。虽然母亲再三婉言谢绝，但在他们坚持下，母亲只好收下了。

九十年代伊始，国家粮食价格开放后，城镇居民粮食供应逐渐取消，粮食价格与市场相差不大，之后购粮证渐行渐远，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计划经济时代早已过去，粮食早已放开面向市场。家里的购粮证，屈指算来已有三四十年，不仅陈旧泛黄，而且很多手写（填）字迹已模糊不清。虽然如此，我总舍不得丢弃，这其中原因，也许是它承载了我们那一代人很多的梦想吧，留给我更多的怀旧情怀。

我想，家里购粮证，不管时过境迁，过去多少年，我将永远珍藏！

小小放牛郎 ■吴长海

我的童年是在极其贫困中度过的，如今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是怎么过来的。因为兄弟姊妹多，家里太穷，又每年超支，父亲为了多点工分，就让我养了生产队里一头老水牛。

我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大的只有五六岁，小的只有几个月，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父亲身体一直不好，那是在严寒的朝鲜战场住猫耳洞时落下的病根，长期咳嗽喘喘的。因负担重，每到年终的时候，我们家便成了超支大户。

父亲很想改变家里的窘境，没办法，只好跟队长金爷请求，能否将队里的牛给一头放放。金爷是个很慈善的长者，问父亲：“你家孩子太小，给了你，谁放呢？”“就我家老大放，他快八岁了，可以放牛。”“那怎么行呢？大海那孩子挺聪明的，又会读书，不能耽误他。”金爷说。“不要紧，我家那几个小子都快五六岁了，他们可以轮流放。这样可以减轻我家一点经济压力。”就这样，金爷终于点了头。

农村放牛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特别是农忙季节，每天夜里两三点钟就要起床，这样到早晨五六点的时候，牛才可以吃饱犁田。要是稍稍起晚了，到出工用牛时牛还没有吃饱，那就要扣一天放牛的工分。那时工分就是命根子，扣了工分，不但少了收入，最关键的是有可能放不成牛了。不过还好，那时生产队有个专职放牛的孤老头儿章武爷爷，他是我家一位远房大爷，每次都是他喊我起来放牛。如今想起来，真该好好谢谢他。

那头老牛在我的精心放养下，不到半年工夫就长得膘肥体壮，犁起田来一点也不比别的牛差。队长看我负责，经常表扬我，说我不但会读书，还会放牛。

一晃几年过去，那头老牛慢慢老了。我呢，也有十二三岁，要到一个离家十几里的地方读中学了。这样一来，放牛的任务就落到了二弟三弟头上。

到我读初三的时候，那头老牛已经老得不成样子，再也不能犁田耙地了。



牧归(网络图片)

我知道，老牛已经老了，生产队再也不会让我们白白地养它了，在不久的将来，是会把它杀掉的。果不其然，那年年底，队委会决定将这头老牛杀了过年，给每家每户分点牛肉改善生活。

杀牛的场面实在太恐怖了。先是几个人把一侧的两条牛腿用绳子捆住，两个人拉住绳子，前面一人牵着牛鼻绳。到了采场后，操刀手遂爷大喝一声：“停！”两个拉牛腿绳的人突然跑到另一侧，遂爷又一声大喝：“拉！”旁边的人帮着猛力一拉，“轰”的一声，牛倒了。遂爷把牛鼻绳猛地拽在手中，用膝盖牢牢顶住牛的下颌，然后把在嘴里咬着的长刀握在手中，在牛身上算了算，瞪着血红的双眼，狠狠地把刀从牛的喉咙里捅进去，随着长刀抽出，一股鲜血从牛喉喷涌而出，老牛“哞”地惨叫一声，一会儿便不动了。

这是我平生见到唯一一次杀牛的经

历，后来生产队也杀过几次牛，但我怎么也不敢再看。我们这些小孩子，在看杀牛的过程中，都尽量躲得远一些，双手也要背到背后。听大人们说，牛在死之前会狠狠记住这些杀它的人，手背到背后了，说明你没有动手，下辈子牛就不会报复你。

那次杀牛的场面让我今生难忘，想起来就头皮发麻心痛不已。想想那头与我一块朝夕相处了五六年的温顺老牛，临死前还流着泪把目光投向我，我看到那分明是求救的目光啊！回想那次我睡着了从牛背快要跌下来，后来听说又是它用牛角把我慢慢顶到牛背上去的那一幕，如今看到它哀求的目光，我却束手无策，不能帮它一把，一时像是万箭穿心般难受，我望着老牛那渐渐模糊的泪光，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失声抽泣泪流满面……